

李何林全集

补遗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李何林全集

补遗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四〇大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李何林全集补遗 / 北京鲁迅博物馆编. —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6.10

ISBN 7-5347-4444-X

I . 李... II . 北... III . 李何林 (1904~1988) — 全集 IV .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7459 号

出版

大象出版社

发行

大象出版社发行部

印刷

北京天龙真彩印刷技术中心

版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定价

36.00 元

目 录

《中国文艺论战》序言	1
《鲁迅论》序	3
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4
简单的意见	16
敬复王、韩、任、俞四位先生	19
在《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上的发言	29
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著作	31
怎样认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	35
读《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	45
我还要“固执己见”	57
《阿 Q 正传》讨论中提出的问题	61
附：对鸣放会上同学发言的说明	
在“放”“鸣”中的编者与作者	69
党的领导和“作品领导”	72
十月革命与中国文学	76
扩大知识范围，多读多写	79
孔老二—北洋军阀—蒋介石—林彪(学习鲁迅，彻底批林 批孔)	82
《儒术》试解	88
揭穿夏衍在电影《林家铺子》中的歪曲和欺骗	93

2 李何林全集补遗

孔孟之道对阿 Q 的毒害和专政	98
纪念五四 学习鲁迅	108
“四人帮”的流毒和鲁迅著作注释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	122
《鲁迅论二三十年代三次左翼文艺运动的言论选》	
前言	126
为刘少奇同志论“两个口号之争”平反昭雪	128
愿和陕西出版社同志们共勉	131
新版《鲁迅全集》的优缺点	134
答庄启东同志	138
1981 年 5 月 18 日在北京市八单位召开的纪念鲁迅诞辰 100 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提纲)	140
《中国文艺论战》重印说明	142
《鲁迅论》重印说明	150
鲁迅《希望》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162
学习鲁迅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心	165
解放战争期间民盟在台湾的情况	168
回忆从台湾到华北解放区	171
忆念吴晗同志	180
《鲁迅小说的艺术》序	182
《五四新诗史》序	184
为《自学》杂志题词	188
给戈宝权文学翻译奖励基金会的贺词	189
任四届、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时的部分提案	190
对王礼逊的《文学党性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一文的评审 意见	200
对潘克明三篇论文的评语	201
为陈鸣树同志写的职称评审意见	203

研究生程广林论文评语	205
贺建成《将艺术的镜头对准现实向理想世界的转化》	
读后	206
对雷声宏评为副编审的意见	208
韩公陶《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鉴定意见	209
对《马恩列斯文艺思想概述》的评审意见	210
对杜草甬的《鲁迅论儿童与儿童教育》和他与戴昊合著 的《试述徐特立同志的教育思想》的评审意见	212
对邓牛顿学术论文的评审意见	214
对许怀中《鲁迅研究的新探索——评刘再复的〈鲁迅美 学思想论稿〉》的评审意见	216
对刘正强同志著作的评审意见	218
对蔡健副教授论文的审查鉴定	220
对王锦泉论文鉴定的意见	223
对黄芥田三篇论文的评审意见	225
对冯光廉论文的评审意见	226
对吴小美副教授论文的评审意见	228
对邱文治的学术论著的评审意见	230
对杨占升论著的评语	234
推荐郭志刚为博士生导师的意见书	237
推荐范伯群副教授为博士生导师的意见书	238
对青海师范大学的推荐信	240
对杜元明的学术鉴定	241
对程凯华著《略论〈野草〉的意境》的评审意见	243
对程凯华作《谈〈湘灵歌〉的主题思想》的鉴定意见	244
推荐严家炎著《求实集》	246
对李鸿然副教授提升为教授的评审意见	248
对魏竞江论著的鉴定意见	250
对王景山同志论著的审阅意见	252

对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推荐意见书	254
刘为民论文评语	256
我对错误的初步认识和批判	257
交代和检查我的几个问题	267
在全系大会上的第二次检查	283
我的简史和问题	298
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南开大学红卫兵组织的交代 材料	303
近七年我写过两次信给姚文元,写过一次信给张春桥的 情况	307
我去年写信给张春桥希望他帮助解决鲁迅研究室的调 人问题,是幻想,也是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和组织 性不强的表现	311
申请恢复 1927 年入党的党龄的补充说明	315
在党中央端正党风教育中在鲁迅博物馆全馆党员大会 上的对照检查	321
李何林传略	332
对长子李豫 1962 年申请复查 1958 年划成右派问题给 南开大学组织上的说明	334
致孔另境(四封)	336
致沈雁冰(二封)	340
致李霁野等(三封)	342
致李豫	345
致刘家鸣等(三封)	348
致谭廉志	351
致《进修》编辑组	355
致安金中(三封)	356

致王世家	359
致爱辉县教师进修学校语文组	360
致孙振笏	361
致颜雄	362
致朱雨滋等	363
致张学植、苏振鹭等	365
致韩之友	366
致韩中民	367
致北京市东城区公安分局	369
致国家文物局领导	371
致边国恩	373
致赵瑞蕻	374
致国家文物局党委、党组等	376
致朱天吉	380
致冯前明(二封)	381
致黄克	383
致裘沙	384
编后记	385

《中国文艺论战》序言

虽然不能像苏联，对于文艺问题曾经党之最高机关召集全国大会讨论过，而且确定了党之一贯的文艺政策；但一九二八年的中国文艺界也曾起了一场颇剧烈的论争。

自创造社一般人嚷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以后，代表中国几个文艺集团的刊物如《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都先后有文字发表。虽然各个的立场不同，其对创造社一般人表示反对的态度这一层则完全一致，同时创造社一般人对于他们也都一一的反攻——批评，尤以对“语丝派”一般人为尤甚。

这论争从一九二八年春天起，足足的继续了有一年之久——现在似乎是渐渐消沉下去了——，在这个时期各方所发表的论战的文字，统计不下百余篇。其中《小说月报》和《新月》的文字只在表明自己的文艺态度或稍露其对于创造社的“革命文学”的不满而已。至于以鲁迅为中心的“语丝派”则和创造社一般人立于针锋相对的地位——也就是它们两方作成了这一次论战的两个敌对阵营的主力。

中国自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文艺界所起的波涛，除了第一次的“文言白话”、“新旧文学”之争而外，这一回可以说是第二次了。这两次论争的情调虽然有些不同，但是这一次的论争在中国文艺的进程上占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大概可以被承认的。

我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总算把这一次论争的文字统统收集在一堆了。起初不过是想看一看这掀动现中国文艺的波涛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要看它的全面，所以就多方面的去找它：过去一年的《语丝》、《北新》、《小说月报》、《新月》，《创造月

刊》,《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流沙》,《无轨列车》,《现代文化》,《民间文化》等等,得朋友们的帮助,都统统很全的找到了。关于这一次论战的文字也都一一的看了过去。这些文字虽不能像苏联的文艺论战的文字有系统,大家都本着那一个系统辩论下去,但以“语丝派”的冷嘲热讽,创造社一般人的宣传文字的笔调,《小说月报》的旁敲侧击,已呈论战文字的大观。我觉得这些文字一方面可以显示中国文艺进程上一个重要时期,它方面对于留心文艺的人也可以从这些文字里面知道一点中国文艺界的现形——了解这代表中国文艺界的几个主要文艺集团对于文艺究竟是怎样的态度。所以在自己一一的看过了以后,就有想“叫大家都能看看”的意思。几个爱好文艺的朋友,也都有这个意见,并且叫我赶快把它们编印成书。于是就剪裁编排,成功了这一本。

不过这里所收集的也不是这一次的所谓“革命文学”和“非革命文学”文献的全数。这里收集的是与这一次论战有关的各方的“论”而且“战”的文字。凡是泛泛的一般论文艺的而不对着或影射着有对方的“战”的文字,都统统割了爱——虽然是同在一个时代发表,看起来也好像是这次论战范围以内的东西。

在编排的时候,我觉得画室的《革命与知识阶级》,对于这一次中国文艺界所起的波动以及知识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上所处的地位,都下一个持平而中肯的论判,实在是一篇这一次论战的很公正的结语,现在就把这一篇不分派别的排在前面,作为这个论战的导言或者结论,以介绍给读者——虽然有人说画室是与“语丝派”一般人颇接近的。

对于秦实、易林以及间接的这一次替我搜集材料并供给我编辑意见的朋友,谨致谢意!

李何林

一九二九,四,五。北京大学图书馆

(《中国文艺论战》,上海北新书局一九三〇年初版)

《鲁迅论》序

鲁迅和鲁迅的著作之惹起近年来国内文艺界和思想界的广大的注意，是不可讳言的事；同时因注意而发表的对于鲁迅及其著作的意见或称为批评的文字，是也颇不在少数的。关于这些文字的收集成书，以供一般读者的参考，虽然已有台静农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和钟敬文的《鲁迅在广东》；但后者限于一时一地，前者所搜集的又仅到一九二六年为止（即使一九二六年以前的也不完全），里面也都不全是理论的批评的文字，而夹杂些记游式的访问篇章。并且自从近两年来所谓“革命文学”喊出来以后，对于鲁迅及其著作似乎已经又有新的评价，又有很多站在另一观点上而作的批评的文字发表了。

得几位朋友的帮助，现在总算把我所想搜集而能搜集的二十多篇文字搜集在一块了。这二十多篇都是理论方面的批评的文字；时间，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九年的最近，一共有七年；代表的文艺集团，有“语丝派”，“新月派”，“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代表刊物如以前的《文学周报》，《语丝》，《学灯》，《创造季刊》和《现代评论》，以及最近的《小说月报》，《北新》，《当代》和《太阳月刊》等。——在质量和时间性上讲，这或者是现时比较可供参考的一本，虽然不能说是应有尽有。

末了，谨将此书献给一般留心中国文艺界和思想界的朋友们！

编者
一九三〇，五，四于北大图书馆

再来一次白话文运动

“这问题从新拾起时，它已决不是民国六七年间新文学运动时代的旧问题，而是人生无穷的旅程上，当前的新问题了。”

——杨振声：《文言文与语体文》

文言白话的优劣论，经过五四时代前后七八年的争辩，和民国二十一年语文改革运动时“文言——白话——大众语”一连串问题的研讨，到现在应该是不成问题了；但是，理论是理论，事实是事实，在理论上虽然近十年来再没有任何复古者敢于作成文章，提出类似“二桃杀三士”或“此生或彼生”的例子，说比“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或“这个学生或那个学生”来得简洁精练，以致闹出错解“士”字的笑话和句意含糊的毛病（“生”非仅可释为“学生”），同时，即使有人提出来，大约也不会有人理睬他了。然而，事实上，我们的社会，文化和教育各方面却是日益加剧的在进行着拥护文言和排斥白话的工作：有许多中学国文教员对学生说：“白话文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随便看看吧！”所以结果学生在课内所接受的教材十分之八九是文言；大多数报纸的社论，电讯和一般新闻，则差不多都是文言，不但小学六年级学生很少能看得懂，就是受了九年教育的初中毕业生也多半读不明白，更不用问我们那些仅能受义务教育的大多数同胞了。当然，这不懂的原因也许有一半是由于他们的知识还不够了解报纸的内容，但我看那另一半原因则应是由于文言形式的艰难了。大多数的公文，通电，布告，宣言，应用文，以及大学一年级必修的

国文教材等等，都是文言的天下。这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它们的存在都是事实的必需呢？假若是的，那主要的理由也不过是“文言简练”吧？但事实上究竟是谁简练，实在是一个大问题！比较词句的长短，是不能作为断定简练与否的标准的，也还得看内容如何，也还得看那样的句子把意思表达得明确与否了。譬如“二桃杀三士”，简练是简练了，但不幸使我们保护文言的大师，且以作合于逻辑的文言文著称于世的章孤桐先生都未能看懂，因而误解了。“此生或彼生”也算简练了，但意思可并不一定就是“这一个学生或者那一个学生”：这“简练”的同时其实也就是“含糊”，有利亦有弊，真是没有法子想的。公文，通电，布告，宣言，应用文，电讯，和一部分报纸的装腔作势的评论，它们之所以都用文言，我看也就是因为它可以“含糊其词”，可以不赤裸裸的说话，不赤裸裸的对人；说好点，就是“含蓄蕴藉”和“持重庄严”吧？这好像上司对下司说话，只能板起面孔讲公事，是不宜于呈露笑容谈闲天的；否则就有点不大庄严，有失身份了。然而倘给老朋友写信，平常本是用惯白话的，这次忽然写起抑扬顿挫，摇头摆脑的文言来了，那么，老朋友是否要说你在同他打官腔，“装蒜”，或有意生疏他呢？这是由于变白话的“亲切”为文言的“隔膜”的缘故。（文言文虽然也可以表现某种程度的亲切，但较之白话，总显得有点“隔”。）“含蓄蕴藉”和“持重庄严”的结果是“隔膜”！我们假使不想欺骗对方或蒙蔽读者，为什么不能说得赤裸裸的亲切明确一点呢？当然，白话文也并非不讲求简练或含蓄，但它却不以字少句短为唯一的条件，像一般人比较文白优劣时所用的一套法宝。

但大中学之所以要教文言文，除学习它的“简练”以外，还有接受文化遗产的理由在。不见那些教材都是从经史子集上选出来的遗产吗？高中三年级的“学术文”且几乎全是周秦诸子和四书五经的“精华”，是我们古代的最好的文化遗产；谁能说黄帝子孙不应该接受祖先的这些遗产呢？但是，问题可不这么简单：第一，我们得看一看如此接受的结果怎样？第二，除此讲授经史子

6 李何林全集补遗

集的办法以外，还有别的较好的方法，能使遗产得以传授下去和使人接受吗？第三，文言遗产究竟对于我们的写作有多大帮助？

第一，我们看一看如此接受的结果怎样：

先就“学术文”的教学情形来说，凡是教过这东西和学过这东西的人，大半都感觉到教者是吃力不讨好，学者是头痛脑裂，所得甚少。即使暂时似有所得，但过时不久，那勉强印入脑子里的一些影像，也就恰似“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烟消云散了。即使退一步说，有些受过高中教育和在大学一年级又读过几篇学术文的人，过了十年二十年以后，仍然记得些经史子集的书名篇名和作者，甚至对于作者的思想识见与词句，还能有所了解和记忆；那我又要问：他所了解的是不是遗产的真像或本质？他所了解和记忆的那一些，对于他十年二十年来的生活有什么帮助呢？除了在大学和研究院研究中国文学，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等等的人们外，那些学农、工、医、商、文、理、教育的人，如此接受的一些遗产，对于他们的所学与所业究竟能有些什么补益？我看除了由于不正确的了解，中了一些国粹主义的复古的毒，养成了阿 Q 式的精神胜利法，说我们的精神文明怎样好，别人的不过是些皮毛的物质文明，应该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法，因而形成了错误的世界观，阻止了自己的进步，也阻止了中国的进步以外，是再没有什么好处了。如果说有的话，那不过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以显示他学理工的人也知道一些儒道墨各家的学说如何如何，庄子，韩非子的文章怎样怎样，而那些如何和怎样根本就是颇成问题的，反而因此在有意和无意之间散布着复古的精神胜利的细菌，如此而已。

根据这种愚妄的对中国文化遗产的认识，所建立起来的“民族自信心”，对于抗战建国有什么用处呢？是仅足自欺，不足欺人的。

当然，由于应用哲学和科学的方法与观点对文化遗产的研究，认识了它的真像和本质，因而形成的不自薄自傲，亦不盲目的崇拜外洋，说中国要全盘西化，等等的思想，是为我们所宝

贵的。

但是，你可以说我上面所讲的那些结果，是由于教者的学识不佳和教法不良造成的，问题的症结只在传授者怎样，不在应不应教这些东西了。那么，现在和过去的高中三年级与大学一年级教学学术文的所谓“佳”的教员，又有几个是胡适，冯友兰，郭沫若，……即能了解古籍或兼有新的哲学观点与科学方法的人？他们不过是翻弄着古人的注解和今人的字书，把字句讲解得“明白”而已。那么，我们就寄希望于将来吧，希望将来能有综合胡、冯、郭……等人的特长于一身的大批学者去教高三和大一的“学术文”。但这希望的实现又是怎样的渺茫呵！这样人的问题既然解决不了，教法的良否也就无关重要了。不过，你还可以：

一、“既然胡、冯、郭……等人对于古书的了解比较进步，那么，我们的国文教员就通读他们的著作，把他们研究的结果介绍给学生，不必定要这些作者本人亲自去讲授，结果岂不是一样？”那我可以说：姑无论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教员，即使有，也就不必定以古人的原作为教材来介绍文化遗产，大略的讲述一下今人整理出来的成绩，对于并非专门研究的大中学生也就够了。（对于专门研究的学生，其办法见下。）

二、“根据注解和字书的讲授，虽然使学生对原作内容了解得不够，但他们总还可以欣赏文章的形式，从而学习篇章结构，和用字造句，并吸收其字词，以为自己的表现工具。”这是十年前施蛰存先生主张青年应该读《庄子》与《文选》以丰富词汇的理由，当时曾为鲁迅先生所反对，最近又为郭沫若先生所赞成，也是一般人主张“要想白话文作好，必须文言文有根柢”的根据，我留待下面“第三”项内再答复。

其次再看看除“学术文”而外的一般文言文的教学结果，它究竟给大中学的学生们一些什么好处呢？这我想也留在下面“第三”项内再说它。

第二，除此讲授经史子集的办法以外，还有别的较好的方法能使遗产得以传授下去和使人接受吗？这问题的解答我是同意

杨振声先生的意见的：

“这里只有一个问题值得严重考虑的，那就是：普遍使用语体文以后，我们如何去接受我们文化的遗产，那些记载在典籍中古人的辛勤的收获？这不是说我们会丧失那些遗产，相反的，那些文化遗产，会在各研究院及大学的各系中，得到更有系统的研究，整理与发扬。我们只看看新文学运动以后，古史研究与古籍整理的卓越成绩，专书或杂志上发表的此类文章之多，可以超越我们历史上任何一段同长的时代。所以文化遗产的传授是绝对不必顾虑的。我们这里考虑的，倒是如何让一般国民都能接受文化遗产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得声明一句，是从来提倡文言与保存国粹的人们所不曾考虑的！”

“我们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得先承认两个条件：（一）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民都去皓首穷经，那样，我们不是饿死，就是覆灭。其实呢，那些主张读经的弃文就武的秀才们又何尝能通一经呢？（二）我们不能重踏历史的往迹，我们得拖着过去的文化，面对着世界向前进。在第一个条件下，我们必须分工合作，让少数人去替国民作整理及翻译的工作；在第二个条件下，我们必须加以选择，选择那些能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立己立人的学问。我们如承认以上两个条件，这个问题便可迎刃而解了。我们为什么不能利用数人或数十人去选择，整理，把我们过去文化的菁英，用一般国民所能接受的语言传授给大家呢？以数人或数十人的精力，便可以节省下几万万人每人半生的时间，这真是功在民间的事，又何乐而不为呢？”（《国文月刊》十九期：《文言文与语体文》）

不过我得补充的是：这些“整理”文化遗产的人们，必须具有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汉学家的考据和参加“古史辨”的人们所采用的方法，虽然它的过去成绩不可厚非，今后也还有它的用处，但它已经是不够的了。十五年来的中国进步的学术界，尤其是进步的史学界，所采用的方法和观点，已经远非“古史辨”时代所能比拟了。

文化遗产经少数人这样整理以后，就“用一般国民所能接受的语言传授给大家”；大中学生当然也可阅览这“整理”后的今人的著作，不必直接去研读古人的“原料”了。如须讲授，也就用这“整理及翻译”后的著作当作教材。不过大学生之研究中国过去的文学，哲学，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等的，则仍须授以原文，并培植其阅读古书的能力，这可专为他们少数人开课讲授，不必定为中学和大学一年级的必修，以免占去他们的时间和精力。

第三，文言遗产究竟对于我们的写作有多大帮助？

我们先看大中学的学术文和一般文言文的教学，对于学生们的白话文写作究有多大帮助，然后再看一般文艺写作者能从文言遗产里面得些什么。

学生们的作文“内容”，除了极少数的历史性题目以外，多是以今人的思想和人生社会为主，那么，如想使学生的作文内容充实，当然是今人的关于现代学术文化和人生社会的著作，对于他们有益。遗产的内容，在大一和高初中学生的作文里面，简直是极少露面。它如能对于学生作文有所帮助，也是坏的影响居多！代圣贤立言，即作古人的鹦鹉，充满了遗老遗少的气息。当然，经过运用进步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整理以后的遗产，不在此内。

至于“形式”方面：现在白话文所用的这一套方块“字”，固然是承继古人的，但是新造的字也很有一些，并且有许多字的用法和含义，都已经和在文言文里面时很有点不同。至于两个字以上所组成的“词”，有许多固然是文言遗产里面所有的，但是新造的和外来的词（名词性的，动词性的，形容词性的，副词性的等等），其数量之多，竟常使那些不大看新书刊的国文教员，不敢讲授白话文，只得向学生们说：“白话文有什么讲头，你们自己随便看看吧！”当然，有时也因为他对内容不大了解——即使了解字面意义，也无从加以发挥或批判，便觉无甚可讲的缘故。罗莘田先生在《中国文学的新陈代谢》一文里面说：“照我看起来，白话文学并不像一般人想像的那么容易懂，就因为它是新兴的文体，